

# 第一章 緒論

「二十世紀以來經濟與科技快速的發展，究竟對國際社會成員間的互動產生何種影響？」一直以來都是學界所矚目的命題，此對於身處兩岸百年泥沼中之吾人而言，實深懷莫大的興趣。近百餘年來，台灣的際遇一直與中國大陸牽涉糾纏纏綁在一起，彼我的恩怨情仇，一代接著一代在手印與汗跡中累積串成一條歷史的因果鏈，而如今「民間熱絡、官方冷漠」則是吾人看到的兩岸互動圖像。然一般咸信，經貿層面的頻密交流，將促成政治層面的漸進整合，而兩岸間的關係，是否將循此途徑，走向統合的未來？兩岸的經貿互動，是否又將註定趨於大幅開放，終而產生莫之能禦的政治影響？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須追根究底的自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往所持立場之因素談起。

即便兩岸政府間互動有限，民間交流卻逐漸擴張，日益衝擊兩岸關係的現狀。此類經貿範疇的互動，即便發生於民間社會，其幅度與方式雖仍受兩岸政府的節制，然則在民間社會力量持續壯大的態勢下，台灣當局有關兩岸交流的政策，最終仍決定於台灣的民意走向。然而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所持立場為何？又受何種因素左右？學界對此似未進行更有系統的探究，本研究之目的便在彌補此項缺憾，作者透過「2006年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民意調查」所得民眾對於兩岸交流的態度，追蹤此類立場背後的決定因素。

然為求前瞻未來，研究設計中將此類因素區分為可能變化的「理性層面」以及根深蒂固的「感性層面」藉此觀察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由來。換言之，吾人認為台灣民眾在面對兩岸交流議題時，存在一個「理性 vs. 感性」的二元空間，前者訴諸「自評利益」、「階級劃分」、「經濟區域」、「部門利害」以及「競爭能力」；後者則受「省籍認同」、「身份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台灣意識」的影響。此外，「自評利益如何認知？」乃是啓人疑竇的，此看似理性但卻暗藏權力與情感糾葛的經濟收益認知，其背後所不為人知之處則將引人遐想。

而在本論文之章節安排方面，作者在論文的第一章首先以兩岸政經悖離結構為開場，接著簡述兩岸關係理論發展，並藉此說明本研究之重要性以及獨特所在。而第二章將回顧相關文獻，首先以理性與感性之相關理論整理爬梳，接著藉由相關研究文獻討論理性與感性的概念運用。而第三章則將就前章所論述之概念運用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接著在之後兩節分別就本論文中的兩個主要模型進行統計檢定與資料分析討論。最後在本文末章的第一部份回顧本研究之發現及研究限制建議，而後進行研究展望與總結。

## 第一節 兩岸政經悖離結構

自 1980 年代晚期以降，政府宣布開放大陸探親，並逐步解除諸如外匯管制等相關限制，海峽兩岸啓動實質的經貿交往。過往的二十年來，兩岸經貿持續擴張，根據陸委會經濟處統計，自 1987 年至 2006 年 12 月海峽兩岸的貿易總額達 5,624.1 億美元、台灣對大陸出口額達 4,441.1 億美元、出超 3,258.1 億美元；台灣經官方核准赴大陸投資金額逾 549.1 億美元、核准件數超過 35,500 多件；而台灣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次，更累計多達 4,208 萬 1 千多人次。<sup>1</sup>以上資料說明，兩岸經貿以及非官方交往日益密切的趨勢。

然而與此同時，自李前總統提出「兩國論」、陳水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以及至今的「四要一沒有」的爭執，<sup>2</sup>相較於過往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對於「一中各表」的共識，上述國家領導人的論述，表現出台灣朝「遠離大陸」乃至「獨立建國」的走向。此外，2004 年「綠色台商」爭議、2005 年台灣聯電與江蘇和艦的「違法投資」，遭台灣檢調單位搜索、<sup>3</sup>以及台商「兩岸春節包機」、「連、宋兩位在野黨主席相繼訪中」等等議題，讓兩岸關係陷入「和解、雙贏」對抗「親中、賣台」的泥沼中，「反分裂國家法」與「正名制憲」的衝擊，更是讓兩岸危機意識提到最高點。在相當程度上，這些議題都能不難讓我們發現兩岸關係中存在著一個政治與經濟相悖離的二元結構。

吳玉山（1997）以「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分析兩岸在政治上「抗衡」或「扞從」的策略選擇，將兩岸經貿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發展中極重要的變數，論述「經濟合作、政治疏離」的兩岸關係結構。其後吳玉山（1999）進一步將台灣的大陸

<sup>1</sup> 資料轉引自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經濟處，《兩岸經濟交流統計月報》，2006 年 12 月。  
[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ass\\_em/9512s.pdf](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ass_em/9512s.pdf)

<sup>2</sup> 「四要一沒有」為陳水扁總統於 2007 年 3 月 4 日出席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 A P A)二十五週年慶祝晚宴時所提出的新主張，其內容為：「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台灣要發展」以及「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詳見自由電子報及相關新聞報導。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5/today-p1.htm>

<sup>3</sup> 相關新聞詳見中時電子報及相關新聞報導。<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2/19/n817130.htm>

政策選擇勾勒成兩個面向：即「統一與獨立」的認同選項和「經濟與安全」的利益考量，並藉由「選票極大化模式」分析台灣內部不同的政治勢力與政治團體對大陸政策的制訂，認為民眾的民意偏好長期以來在「認同」與「利益」兩軸線上呈常態分配。然而在這種民意結構下，選票極大化的誘因，將促使以勝選為考量的政黨放棄原先較為強烈的大陸政策立場，轉往中間靠攏，然而在意識型態的侷限下，各政黨派系靠攏的幅度又有所差異。

換言之，這意味著各政黨派系的兩岸政策將會在民意結構的制約下，在「認同」與「利益」所架構的平面中游移、尋求最合適的位置。吳氏對於兩岸關係結構之論述，無疑切中「1990年代中後期，兩岸關係不再為政治菁英所完全決定」之重點，然可惜的是，其處理的重點仍在於現實政治勢力的操作，其並未深入處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往態度所持之立場因素。僅以民意調查資料中「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為剛好」的多數比例，作為民眾在利益軸線上常態分配的基礎，此則略顯不足。

既然當前兩岸關係的局面，基本屬「政治疏離、經濟融合」(吳玉山，1997：159)，且台灣當前的內在民意結構(陳義彥、陳陸輝，2003)與外在三邊局勢(Wu, 2005)，大致均能維持穩定，則無論藍綠陣營執政，目前的「政治疏離」，似將長期持續不墜。如此則衝擊兩岸現狀、型塑兩岸未來的力量，較可能來自潛移默化的「經濟融合」面，以此對照吳氏論點，即為「認同面」是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變動的可能將主要來自「利益面」的變化，當兩岸關係中的「利益面」(理性因素)或「認同面」(感性因素)的條件產生變化，兩岸關係結構將隨之改變。進一步推論則發現，當民意偏好有所改變，在「選票極大化模式」的運作下，各政黨的大陸政策的位置將隨之移動，無可避免的將改變兩岸關係現況與發展。

事實上，關於兩岸關係的民意偏好早已悄然改變，但卻淹沒於浩瀚的事件史料以及無窮盡的情勢分析資料而鮮少被察覺。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民主選舉以及商界力量的蓬勃，造就了政治菁英的多元組合以及民間社會的多元力量，多元

政治格局使得政府不再是政策上的完全行動者，執政的走向不但要考量其他競爭政黨派系的挑戰，同時必須接受台灣民意的考核，特別是攸關兩岸關係的議題上，不論是執政或在野都顧忌其自身的政策論述遭人指控為出賣「台灣利益」而可能成爲下次選舉的輸家，因此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民意看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第二節 兩岸關係理論發展

然如一般咸信，經濟面的互動，會在一定程度上波及(spill-over)政治面的關係(吳玉山，1997：119-169；魏鏞，2002；耿曙、林瑞華，2004)。換言之，兩岸經貿的頻密交流，極可能逐步促成兩岸的政治統合(耿曙，2003；Keng，2003；耿曙、林琮盛，2005)，面對可能因此帶來的政治後果，兩岸政府或極力預作防範、或多方積極促成，分別推出如「戒急用忍」或「補貼讓利」之類的政策(吳玉山，1997：119；耿曙，2003：477-479；耿曙，2005)。但不論因應政策為何，兩岸經貿的持續擴張，仍係不可阻遏的趨勢(高希均、李誠、林祖嘉編，2006)。兩岸關係的未來，是否便將因此漸趨統合呢？

就「利益面」觀察，兩岸經貿交往持續擴大似乎意味著民間統合聲音將持續壯大，但就實際情況看來，目前「政治疏離」的態勢則並未扭轉，且從「認同面」的觀察可以發現，近年來本土認同者持續增加，但在兩岸彼此猜忌且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兩岸交流如有出軌，即會受是否忠誠之議，如有唱衰，則將受是否通敵之論(張亞中，2003)，作者對此矛盾議題則深感興趣。

上述種種問題雖不容輕忽，但綜觀現有文獻，多數立基西方理論，勇於放言預測，極少就近取譬申論，契合兩岸現狀，但整體而言，研究成果相對貧弱，且各家觀點莫衷一是，對此攸關兩岸未來的議題，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通說(Keng，2003，耿曙，2005)。對此，就吾人所見，其問題徵結在所持「國家行為者」(state as unitary actor)的預設。據此，兩岸關係多被化約為「兩造互動」(dyadic model)(耿曙、林瑞華，2004)。然而「國家」之下或「國界」之外的民意動態、決策過程、跨國交流等層面，均不免遭到忽略(Sheng, 2002)。而且基於上述預設，兩岸研究的焦點，似應集中於官方政策與菁英互動，結果則「容易專注於每日、每時段局勢發展，卻沒有對兩岸關係從事長期和深度觀察的興趣和能力」(吳玉山，1997：2)。

以此吾人藉以回顧過往兩岸關係研究理論中的兩大範疇，耿曙、林瑞華（2004）將兩岸關係研究文獻分爲「雙邊模式（dyad model）」與「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兩大範疇，並檢視其不足之處，其後提出以國家-社會關係爲分析焦點的替代解釋框架，此即「連綴社群」的操作架構。<sup>4</sup>其認爲「雙邊模式」將台灣與對岸視爲對立的兩造，並將其觀察焦點鎖定在兩岸的主政者或決策模式，忽略了「非官方」或「次國家層級」接觸的影響。而「整合理論」雖然重視交流所造成的統合效應，但卻因「社會中心」與「國家中心」預設的歧異而得出了兩個相斥結論，同時「整合理論」亦缺乏了兩岸各自對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縱向聯繫」。

「雙邊模式」預設的邏輯在於「將台灣與中國定義爲相互獨立的政治行爲者，兩岸政府擁有完全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強制力，國家意志得以貫穿領土中各社會階級、階層與團體且不被干擾。」。換言之，「雙邊模式」只從「國家層級」來探討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然而這樣的預設將產生幾個問題，首先，「雙邊對立」的預設有意無意的忽略兩岸問題的歷史脈絡，將兩造視爲不相干甚至相互對立的政治實體，此乃把兩岸問題簡單化。同時當突顯兩岸互不隸屬的主權地位時，雙邊的對立與競爭勢必壓倒兩岸可能發生的同化與整合，儘管兩岸的經濟社會聯繫再強，也無法改變「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預設命題。

而「雙邊模式」將兩岸等同視爲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命題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其等若認同政治菁英一旦掌握國家機器，將可把所有社會資源置於麾下並掌握人民行動，隨心所欲的在國家內貫徹其主張。然而與此相對的是，在經過數次大選洗禮後，台灣基本完成民主轉型，轉型過程中所興起的強大社會力量，迫使台灣當局不論在民生政策抑或國家大政方針都必須與各種社會力量折衝，並顧及各利益團體的要求。因此，以「雙邊模式」作爲處理兩岸關係的分析架構則產生了日益嚴重的問題。

---

<sup>4</sup> 關於「連綴社群」之概念及進一步的闡釋，參見耿曙（2003）。

關於「雙邊模式」可包括「分裂國家模式」：<sup>5</sup>其主要的論述即預設以「統一」為前提，並藉由東西德、南北韓為經驗，將其分裂的模式與原因類推於兩岸關係，張五岳（1999）則指出，德韓兩國經驗無法用於兩岸關係上的原因乃在於北京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相對的政治實體，此造成兩岸關係發展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從國際關係角度而言，以「美中台關係」或「國際戰略」來看就兩岸關係雖有助於吾人瞭解國際外在環境的變化，但其預設仍與「雙邊模式」無異。如包宗和（1999）即以「戰略三角理論」來說明「美中台」三個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著重於美國對台海雙邊關係發展的作用。<sup>6</sup>而明居正（1999）以「國際體系理論」<sup>7</sup>將台灣和大陸置於整個國際體系結構中，以冷戰後的發展歷史來檢視國際架構與兩岸關係。

吳玉山的「大小政治實體」理論雖為極富創建之作，但其中亦見「雙邊模式」的影子，而後以「選票極大化策略」來補其國內因素的作用，但本質上仍是屬「以政治菁英為主的策略理性選擇」。「民意偏好」只為政治菁英在選擇政策立場中的一項制約條件，其並未就「民意偏好或分佈」做深入討論。因此，上述各種理論的運用皆難脫「雙邊模式」之範疇。

然另一方面，為彌補「雙邊模式」無法解釋兩岸交流所造成的影響而借歐洲整合經驗所興起的「整合理論」，<sup>8</sup>其關照民間交流的統合效應但卻得出了兩個南轅北轍的結論，即兩岸在政治上「終將統合」與「繼續對立」，然而之所以如此，仍然在於兩派的預設不同，蘊涵「社會中心」的分析者認為兩岸橫向交流且相互連綴的利益團體，其跨邊界的溝通，將會有效降低彼此間的敵意與不信任、疏通歧異並塑造共同利益，繼而創造政府政策的產出使兩岸走向統合；而以「國家中心」的分析者則認為，兩岸整合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政府制訂有利於整合的政策，

---

<sup>5</sup> 關於「分裂國家模式」的討論可參閱，趙建民（1995）；張五岳（1999）。

<sup>6</sup> 關於「戰略三角理論」可參閱，包宗和（1999）。

<sup>7</sup> 關於「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的相關戰略論述可參閱，蕭全政（1995）；明居正（1995、1999）。

<sup>8</sup> 關於「整合理論」的派流與運用可參閱，吳新興（1995、2001）；高朗（1999）；張亞中（2000、2001、2003）；



社會力量仍屬配角，政策的產出雖然反映社會利益但根本上仍是政治菁英所持共識所致。新功能主義的整合論者所關切的重點在於，當兩個政治體彼此交流互動日益綿密、參與的人員、團體數量越多將帶來整合的壓力，並且就由政治菁英的調理與共識將造成制度上的「質變」，此時政治菁英與官僚則成爲整合的最重要的角色。

然而如今時勢大變，民主化、全球化潮流漫天席捲，之前所採的方法預設，似乎不無修正必要。再者吾人對理論的要求也將有所提昇，希望能基於更穩定的面向，就兩岸變化的趨勢，提出更通則性的論述。隨著台灣的民主體制進一步的鞏固、深化，無論於己於彼，「國家」對「社會」的安排與宰制都漸成過往（耿曙，2003）。當「國家」對於「兩岸交流」的支配，呈不得不鬆綁之態勢，兩岸關係將是不再以主權對立爲前提的交流關係，過往兩岸關係中的國家論述將有必要重新思考檢視，兩岸關係研究則必須回歸於作爲實踐者的民間社會（石之瑜，1998；2003a；2003b）。

隨著兩岸相繼邁入「全球時代」，個人自族國中漸次剝離，兩岸民間交流與日遽增，聚合個體的民間力量逐步走向自主發展並擴大影響。面對彼岸，台灣對於「抗衡」（balancing）或者「扈從」（bandwagoning）的策略選擇，除了考量兩岸經濟發展差距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程度外（吳玉山，1997），台灣內部的「民意態度」將成爲左右未來的關鍵變項之一，原因在於既然「兩岸經貿交流」將決定「兩岸未來」，而政府對於「經貿交流」的緊縮或鬆綁實乃繫於「民意立場」的支持，則當政治權力源於固定的民主選舉之際，民主國家領導人對於政策的管制或提出，則必須永遠顧慮到一般民眾（public opinion）的觀點。當兩岸經貿交流政策，最終仍須決定於台灣民意走向之際。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所持立場爲何？又受何種因素左右？學界對此似未進行更有系統的探究。本文的目的便在彌補此項缺憾

探究兩岸經貿關係中的民意立場爲何？是否依循「自利至上」爲行爲準則？

若為是則自評利益又是如何認知？若為非則民意立場又是受哪些因素所影響？這些問題顯然成為吾人首要釐清之重點。就學理上而言，學界目前對於「兩岸經貿交往」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正負，<sup>9</sup>諸如「產業空洞化」、「失業率」、「產業升級」等爭議；以及影響「台灣國家安全」的方向性，諸如「屠城木馬」、「以商逼政」、「政經統戰」等爭議，仍尚存正反兩造說法且未達共識。再者，個人的學識經歷各有千秋，對於議題的選擇自有見解，因此吾人似乎不應執著於非黑即白的論述，應抱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從可能影響兩岸經貿議題立場的因素開始進行。

因此對於影響民眾自身的兩岸經貿交往立場之因素而言，作者認為一部份可能來自於「工具性的選擇」、而另一部份則可能是「認同面的價值」，前者是條件式的、可變動的、是「理性取舍」的；後者則是原則性的、不妥協的、是「感性認同」的。據此，筆者將就台灣民意之「理性層面」、「感性層面」二者，觀察其如何影響台灣民眾對兩岸交往所持態度。具體而言，本研究意在探求針對兩岸互動議題，個人基於「理性利益」的考量，是否將壓倒其「認同價值」的牽掛？另一方面民眾理性利益的考量又是從何而來？換言之，兩岸經貿議題中的自評利益是否為純粹的理性分析，抑或仍不脫感性認同價值所羈絆，此為本研究另一個觀察的重點。

綜合上述，本文試圖脫離傳統兩岸關係研究以國家或政黨派系(或政治菁英)為主要研究對象之範疇，從一般民眾 (general public) 的角度出發，探尋兩岸關係結構的根本因素，而據此較為穩定的層面，蠡測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前景。在本章中，作者論述研究緣起及研究之重要性，同時歸納出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往議題所持立場的兩個可能層面，一則為理性因素二則為感性因素。然而在本研究第二章中，作者將就理性與感性之相關文獻整理爬梳後，同時進一步釐

---

<sup>9</sup> 關於相關爭議的文獻實為浩瀚，對於正反兩造諸多說法，略可參見冷則剛 (1999)；童振源 (2003)；高長 (2002)；耿曙、林琮盛 (2005)；耿曙 (2003)；群策會，(2004)；林繼文、羅致政 (1998)；Leng, 1996; Myers et al., (2004)。

清理性與感性的概念架構與研究運用設計。